

陇上学人文存

李鼎文 卷

李鼎文 著 伏俊琰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陇上学人文存·李鼎文卷 / 范鹏总主编; 李鼎文著;
伏俊琰编选.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26-04595-4

I. ①陇… II. ①范… ②李… ③伏…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C53
②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92115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宋学娟

封面设计: 王林强

陇上学人文存·李鼎文卷

范 鹏 总主编

李鼎文 著 伏俊琰 编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7 字数 325 千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978-7-226-04595-4 定价: 60.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印厂联系)

《陇上学人文存》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陆 浩	刘伟平		
主 任：	励小捷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咸 辉		
副 主 任：	张建昌	张瑞民	范 鹏	
委 员：	张余胜	吉西平	魏胜文	高志凌
	张 炯	安文华	马廷旭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范 鹏

副总主编：魏胜文 马廷旭

《陇上学人文存》第三辑

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三运	刘伟平		
主 任:	连 辑	张广智		
副 主 任:	张建昌	范 鹏	马成洋	
委 员:	管钰年	吉西平	王福生	陈双梅
	朱智文	安文华	刘进军	马廷旭
	张亚杰	李树军		

学术指导委员会

王希隆	王肃元	王洲塔	王晓兴	王嘉毅
傅德印	伏俊珽	李朝东	陈晓龙	张先堂
郝树声	贾东海	高新才	董汉河	程金城

总 主 编: 范 鹏

副总主编: 王福生 马廷旭

总 序



陇者甘肃，历史悠久，文化醇厚。陇上学人，或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学者，或外来而其学术成就多产于甘肃者。学人是学术活动的主体，就《陇上学人文存》（以下简称《文存》）的选编范围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存》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甘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每人辑为一卷，或标时代之识，或为学问之精，或开风气之先，或补学科之白，均编者以为足以存当代而传后世之作。《文存》力求以此丛集荟萃的方式，全面立体地展示新中国为甘肃学术文化发展提供的良好环境和陇上学人不负新时期期望而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的新贡献，也力求呈现陇上学人所接续的先秦以来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根文脉。

陇原乃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人文学脉悠远隆盛，纯朴百姓崇文达理，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学术土壤积久而沃，在科学文化特别是人文学术领域的探索可远溯至伏羲时代，大地湾文化遗存、举世无双的甘肃彩陶、陇东早期周文化对农耕文明的贡献、秦先祖扫六合以统一中国，奠定了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始源性和奠基性的重要地位；汉唐盛世，甘肃作为中西交通的要道，内承中华主体文化熏陶，外接经中亚而来的异域文明，风云际会，相摩相荡，得天独厚而人才辈出，学术思想繁荣发达，为中华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以来，甘肃相对于逐渐开放的东南沿海而言成为偏远之地，反而少受战乱影响，学术得以继续繁荣。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大



后方，接纳了不少内地著名学府和学者，使陇上学术空前活跃。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为国家民族的新生而欢欣鼓舞，全力投入到祖国新的学术事业之中，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众多知名专家，在历史、文献、文学、民族、考古、美学、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均居全国前列，影响广泛而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文社会科学几次对当代学术具有重大影响的争鸣，不仅都有甘肃学者的声音，而且在美学三大学派（客观派、主观派、关系派）、史学“五朵金花”（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重点研究的历史分期、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史等五个方面的重点问题）等领域，陇上学人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学者更是如鱼得水，继承并发扬了关陇学人既注重学理求索又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甘肃学者新的风范。宋代西北学者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乃中华学人贯通古今、一脉相承的文化使命，其本质正是发源于陇原的《易》之生生不已的刚健精神，《文存》乃此一精神在现代陇上得到了大力弘扬与传承的最佳证明。

《文存》启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选择入编对象时，我们首先注重了两个代表性：一是代表性的学者，二是代表性的成果，欲以此构成一部个案式的甘肃当代学术史，亦以此传先贤学术命脉，为后进立治学标杆。此议为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首倡，随之得到政界主要领导、学界精英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同与政府大力支持，此宏愿因此而得以付诸实施。

为保证选编的权威性，编委会专门成立了由十几位省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发放推荐表格和学术机构、个人举荐等多种方式确定入选者。为使读者对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和重要贡献有比较准确和全面的了解，在出版社选配业务精良的责任编辑的同时，编委会为每一卷配备了一位学术编辑，负责选编并撰写前言。由于我院已经完成《甘肃省志·社会科学志》（古代至1990年卷，1990至

2000年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文存》的选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基本依据,加之同行专家对这一时期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使《文存》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同期内甘肃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

我们的愿望是坚持十年,《文存》年出十卷,到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达至百卷规模。若经努力此百卷终能完整问世,则从1949至2009年六十年间陇上学人以“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献身学术、追求真理的轨迹和脉络或可大体清晰。如此长卷宏图实为新中国六十年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全部成果的一个缩影,亦为此期间甘肃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业绩的一次全面检阅,堪作后辈学者学习先贤的范本,是陇上学人献给祖国母亲的一份厚礼。此一理想若能实现,百卷巨著蔚为大观,《文存》和它所承载的学术精神必可存于当代,传之后世,陇上学人和学术亦可因此而无愧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并有所报于生养我们的淳厚故土。

因我们眼界和学术水平的局限,选编过程中必定会出现未曾意料的问题,我们衷心期望读者能够及时教正,以使《文存》的后续选编工作日臻完善。

是为序。

2009年12月26日

编选前言

今年,是李鼎文先生九十五华诞。征得先生的同意,我编好了他的论文集《陇上学人文存·李鼎文卷》,作为敬献给先生的礼物,并祝这位旅居南半球的陇上学人走向期颐之年。

1998年11月,先生为拙著《人物志研究》写完序不久,即赴新西兰定居。次年《人物志研究》出版,我在《序》的后面题写了这样几句话:“鼎文先生,凉州世家,族望通明。茂苑仪型,门风清邵。少承家学,谨慎劬敏。名儒敦海,常闻长者徽音;故老披宣,颇记先贤逸事。弱冠负笈金城,始承名师。洒笔成文,耽思述古。”那么,这篇前言就从先生的家世写起吧。

李鼎文先生的祖父李铭汉(1809—1891),字云章,受业于著名学者张澍(1776—1847),是甘肃有名的学者,虽以布衣终其身,但因德行高尚,学问渊博,孚重望于乡邦。学问以经世致用为宗,经史辞章之外,旁及天文、算法、舆地、兵农,凡有关国计民生者,靡不详究。辑有《续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一十卷(前八十九卷为李铭汉编辑,后二十一卷为铭汉之子于锴编辑),《尔雅声类》四卷,《说文谐声表》(未成),以及读书笔记《宿问录》,诗集《日知斋诗稿》等。其《续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是史学名著。1936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续通鉴纪事本末书后》一文,呼吁重印此书,云:“不得李氏之书,使家喻户晓,于据撰通史之资料,不无缺憾。”著名学者汪辟疆也说:“余于清末,既获读李氏《续通鉴纪事本末》,见其条件系,伦类贯通,深致叹服。”(《记与马生驥程谈李云章父子学术》)《续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李于锴在山东刊刻



问世,印数极少,流传不广。1957年,在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范文澜先生的力促下,北京古籍出版社又据原版印行一次,始为学界所渐知。2005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点校本。

李鼎文先生的父亲李于锴(1863—1923),字叔坚,李铭汉的次子,光绪八年(1882)举人,二十一年乙未(1895)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戊戌(1898)散馆,任山东蓬莱知县。其后代理武城、泰安知县,调山东大学堂监督,为山东大学的创办人之一,旋升沂州府知府。辛亥革命后返里。民国二年(1913)被任命为甘肃警察厅长,坚辞不就。三年(1914),聘为清史馆协修,亦未就。著书立说,终于家。李于锴生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少承家学,忧国忧民,“致力于志士、循吏、学人三种境界,均有突出业绩”(《甘肃历史名人画传·清末民初文学家李于锴》)。作为学者,李于锴除续成《续通鉴纪事本末》外,尚有《古历亭笔记》一卷,《读汉书笔记》一卷,皆为文史考证之作。其文学创作,诗文兼长,尤长于文,有《味槃斋文集》一卷,《写经楼诗草》一卷。1984年,李鼎文先生把《味槃斋文集》(增补了《甘肃举人呈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古历亭笔记》、《读汉书笔记》、《写经楼诗草》合为一集,经过精心整理,定名《李于锴遗稿辑存》,列入《陇右文献丛书》出版。《遗稿》收录了37篇各体文章和125首诗。清末古文大家王树楠在《味槃斋遗稿序》中说:“平生不苟为无益之文,故今所存者,仅十数篇,然于昔贤之所谓义理、词章、考据三者无一不备,而杼轴在心,动与古会。其文品盖在同里张介侯之上,西方学者莫能或之逮也。”

李于锴有两个儿子,长子鼎超,次子即鼎文先生。李鼎超(1894—1931),字酝班,10岁随父至山东蓬莱开始读书,13岁至沂州(今临沂)系统地学习“中学”(经、史、子、集)和“西学”(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博物诸科)。民国二年,20岁的李鼎超随父返回故里,潜心研究国

学。自谓“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四者并进”(《自得斋日记》民国十年九月十六日)。民国十八年(1929)春,至兰州,任甘肃省通志局分纂。其后又在兰州中山大学讲授文字学。民国二十年(1931)春,以无党派人士被选为国民会议代表,赴南京参加了国民会议后,病逝于上海医院。李鼎超曾拟集注《新唐书》,没有完成。民国十年(1921),受父亲的委托,编纂《武威县志》。他博览群书,辛勤搜寻,已完成者,有《人物志》、《艺文志》、《金石志》、《方言志》。

《方言志》为鼎超先生的得意之作,从草创到脱稿历时十年,后改名《陇右方言》。他说:“治国学必习小学,小学之最切用者在方言”,“樵夫牧竖之口,往往有三代雅辞存焉”。章太炎先生在《新方言序》中写道:“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升于皇之赫戏,按以临瞻旧国,其侧怆可知也。”二位先生研究方言,是为了证明姬汉的传统犹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不会消灭,学术精神是如此相同。《陇右方言》即着力在甘肃(侧重河西)方言中考索保存至今的古代词语和古音,沿波讨源,运用古今声韵转变的规律,博采《尔雅》、《方言》、《说文》及经传典籍加以证明。其体例则依章太炎《新方言》,分“释词”“释言”“释亲属”“释形体”“释器”“释宫”“释天”“释地”“释动物”“释植物”十卷,共1214条。其中考证精当、发前人所未发者,随手可举。如形容花儿“红丢丢”,太阳“红丢丢”,“丢丢”之本字,即《诗·桃夭》“灼灼其华”之“灼灼”,“灼”古音读如“丢”。又如我们之“们”,古无此字,实即“辈”字之声转,“辈”“伟”古音同在灰部,唐宋时有“儿郎伟”之语,宋楼钥《跋姜氏上梁文稿》云:“所谓‘儿郎伟’者,犹言‘儿郎懣’。”又云:“‘懣’本音‘闷’,俗音‘门’,犹言‘辈’也。”著名语言学家黎锦熙对此书大加赞赏,曾力促出版之事。语言学家,美国南加州大学铁鸿业教授评价此书“对研究小学、字源,提供参考资料,价值尤为卓越”。1988年《陇右方言》由李鼎文先生整理后由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李鼎超从二十七岁起(1920年12月12日),开始写《自得斋日记》,直到逝世前六天(1931年5月19日)止,凡十余册,中多论学论政之文。自谓:“其中亦多见道之谈,英辞眇议,亦时时有。虽未足上拟大雅,而侧诸今学者之林,亦未有惭色”(《自得斋日记》民国十八年九月十九日)。又谓:“予于文壮《史》《汉》,于小学喜二王(念孙、引之),于义理好《庄子》,于近人之文乐王(闾运)、章(炳麟)。”(《自得斋日记》民国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可见《日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惜在“文革”中全部遗失。

著名学者汪辟疆先生曾撰有《记与马生驥程谈李云章父子学术》,对李氏三世的学术做过总结。他认为,西北远处边隅,与中原阻绝,俗本淳朴,而布衣韦带之士,皆崇尚气节,耿介自守,恒能自奋于义所应为。如果是利泽桑梓,功效边陲,益于国家之事,皆能挺身以赴,在所不惜。这是李氏之学中体现的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气节。汪先生总结说:“云章父子之学,其取师也甚正,其信道也弥坚,其为之也必果,而皆并见于立身立事之实。故不托之空言,而惟实事求是;不泥于小节,而惟大德不逾。”这里,汪先生指出了李氏之学的三个特点,三种境界。

其一,取师纯正。他说:“夫学必有师,师法正则学术正,学术正则人心正。”“云章虽先后受教于尹世阿、张澍,亦尝从事于声音训诂雠校之学,然平生论学,实主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言。”“叔坚一禀其趋庭之训,而又兼师四明全氏。……昆山、四明之学,皆博采于濂、洛、关、闽及余姚,而参证于经术,以植其本;浏览于治乱兴亡典章制度,而斟酌其得失,以观其通;旁涉于声音、训诂、舆地、兵农、天算,而详抉其奥微,以尽其变。故李氏父子之学,咸奉二先生为依归,坐而言,起而行,规模气象,俨然为康、雍间名儒,无晚近破碎支离之习。”

其二,学求致用。汪先生说:“试迹李氏父子平生之学,以濂、洛、关、闽为体,以训诂、辞章为用,而并皆湛深于史。故其言皆菽米布帛之言,其事皆伦常日用之事,平实而近人,坚卓而自信,有其内者必见于外,所谓有用之学,其为之也必果也。”刘尔炘《武威李叔坚传》云:“读书万卷,群指目为经师,而行谊或不免荡逾于闲检者,失之肆;繁称博引,下笔千言,而授政不达,枘凿龃龉者,失之迂;以声音训诂为毕生大业,征文考典,动辄数十百纸,而无关于身心家国者,失之琐。”叔坚先生高尚的节操,成功的政绩,一生关心国事民瘼的精神,正是他学以致用集中体现。

其三,对“天下之达道”的笃信和挚守。所谓“达道”,就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几千年孜孜追求的至情至理,“其大旨以诚信为本,以勤俭为用,以孝弟为教,以仁恕为施。治己治人,莫不本此”。《孟子·滕文公下》云:“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气节和精神,正是李云章父子身体力行而终生追求的,是贯穿他们学术研究的主题。所以,汪辟疆先生绌绎李氏之学,感慨系之:“李氏三世之学行,实有足以振末俗而惩学弊者,询足以质诸百世而不惑者也。”

民国时期甘肃著名学者刘尔炘曾撰有《武威李叔坚传》,其中写道:“学术者,我之精神命脉也。学术亡,则我之貌存,我之魂死,何异沦中华为异域,化四万万人为异物哉?此余之所以仰天长号,而不独为叔坚悲者也!”即以叔坚子鼎超而言,其参加国民会议,洞见当时政界之真相,极度失望,抑郁成疾,而不得不死。我记起了陈寅恪先生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



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他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也说:“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以共喻。”我觉得借用陈先生的话来评价李鼎超先生,庶几近之。

李鼎文教授,字献甫,1919年5月16日生于甘肃省武威县。他5岁丧父,13岁丧兄,与生母相依为命。他没有上过小学,13岁以前,由长兄鼎超言传身教。民国二十六年(1937)和二十九年(1940),先后由武威师范简师科、兰州师范中师科毕业。民国三十一年(1942),考入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科,受教于黎锦熙、李嘉言、叶鼎彝、何士骥、王汝弼、刘文炳、冯国瑞诸位名师,学业大进。尤其是黎锦熙、李嘉言先生,对他格外器重。1949年,在西北师范学院国文系四年级插班,次年毕业,任教于武威师范。1956年调甘肃师专(校址在水)任教。1957年,甘肃师专合并到西北师院,李先生随即到西北师院任教,任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87年退休。

李先生读书广博,举凡经史子集四部的基本典籍,靡不广为涉猎。几十年来,先生以教书为要务,主要精力集中在备课、编写讲义方面。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先生编写了《中国文学史》(先秦到宋,80千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先秦到宋,150千字),1957年油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元明清,90千字),1973年铅印。讲授“杜诗研究”,先生编写了《杜甫诗选注》(126千字),1981年油印。讲授“敦煌文学”,先生编写了《敦煌文学作品选注》(50千字),1982年铅印。先生还参加编写了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撰有初中、高中语文课本中文言文讲析31篇(136千字),收入《中学语文讲析》一书,1979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先生编写的讲义字数并不多,但都是

在自己深入体会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皆深思明辨之作,有着丰富的学术含量。

先生编写讲义,非常认真,比如对某一作家的评价,必先认真阅读他的全部作品,然后仔细阅读历代学者对他的评价。不佞信前人说法,也不随意怀疑前人的说法。古代作家的每一次行踪,每一件行事,其作品的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典故,必详考而明辨,求水落而石出。现在一些人编写讲稿、著书立说,大都用剪贴的方法,附会凿空之谈太多。一提笔动辄数十万言,不数年而著作等身。讲起某一作家来,洋洋洒洒,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然而一旦涉其人具体作品,则喑哑若禁錮,顾左右而言他,期期不知所云。与先生相比,诚不可同日而语矣。

先生在教学之余从事学术研究。1986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甘肃文史丛稿》,收集了先生多年撰写的有关甘肃地方文史的文章42篇。最早的写于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为1980年以后应省内一些杂志之邀所写。文集考证了36位甘肃籍或旅居甘肃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创作及有关史实,刊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订正了当今一些诗文选本的错误。通过这本书和他主编的《甘肃古代作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我们可以对甘肃古代的主要作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比如,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的生年讹误已久,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都定于“乾隆庚子”(1780),李先生根据有关地方志史料,并走访了张澍六世孙张随纯,确定张氏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新版《辞海》即按他的考证予以改正。再如《评介甘肃举人〈请废马关条约呈文〉及其他》一文,公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请废马关条约呈文》的起草者和领衔者正是李先生的父亲李于锴,他当时是甘肃在北京的应试举人。这是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运动的重要内容。甘肃参加的有76人。呈文准备送到都察院时,《马关条约》已批准,事情已无



可挽回,就把写好的呈文保存了下来。李先生将手稿和缮写好的呈文于1963年捐献给甘肃省博物馆。这篇文章以确凿的史料无可辩驳地论证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反帝反封建运动中,甘肃的热血青年冲锋陷阵的情境。总之,《甘肃文史丛稿》一书,或论一人一事,或议一诗一文,皆能明其脉络,抉发隐微,明训诂,证史实,不蔓不枝,简明精练。一位饱经风霜的知识分子对历史事件的是非正义之心,对故乡人文历史的衷心热爱之情,读其书者自能明之。李先生把这些文章看作竹头木屑,然而伐蜀装船,积雪厅事,真可以顶大用。

1983年,按照中央关于整理古籍的指示,西北师范学院建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受所长彭铎教授、副所长路志霄教授的委托,李先生在整理陇右古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先后整理出版了《续敦煌实录》、《李于锴遗稿辑存》、《陇右方言》、《陇右方言发微》(与钮国平合作)、《笠云山房诗文集》(与吴绍烈、路志霄、海呈瑞合作)等。

敦煌为中原与西域交通的要道,自汉武帝后元元年(前88)分酒泉而置敦煌郡以来,人文渐盛,名家辈出。两汉三国,六朝递嬗,五凉三秦,建国西夏,诸世族之贤者,或仕中朝,或佐霸主,叱咤风云,舞文弄墨,领风骚于一时。其间西凉人刘昉辑诸史所载,成《敦煌实录》二十卷(《魏书·刘昉传》作二十卷,《隋志》作十卷),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说:“夫十室九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阯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昉载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向使两贤不出,二郡无记,彼边隅之君子,何以取闻于后世乎?”是书已佚,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据诸书辑得十四条,稍后的武威人张澍《续敦煌实录》卷首即刘昉《敦煌实录》的辑本,其中三条章本未辑,章本中三条亦为张本所未辑。《续敦煌实录》五卷是张氏从大量文献中采集的敦煌籍人物的传